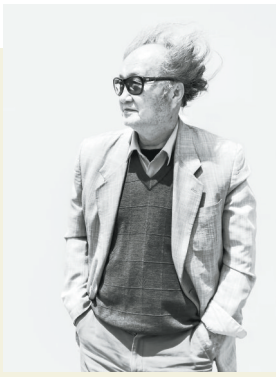


左海会客厅



本期嘉宾

孙绍振 1936年生,祖籍福州长乐,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教育家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,曾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、福建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。有专著《文学创作论》《论变异》《美的结构》《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》《孙绍振文集》等。

孙绍振：“进攻者”的美学

本报记者 燕晓

推开福建师范大学教职工宿舍的房门,最先闯入视野的是满溢的书,从客厅地面擦到天花板,旧书的墨香混着老房的潮气。最新版的《孙绍振文集》被精心摆放在书架上,满满一排。

墙上,一幅装帧精美的肖像照格外惹眼。照片里的孙绍振身姿潇洒,带着几分随性,这是他在马祖岛旅游时粉丝

拍摄的。角落一幅涂鸦自画像露出来,上书一行字:“那个被谢冕认为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人”。

已经90岁的孙绍振坐在书堆间的藤椅上,鬓角染霜,说话时眼角细纹轻轻皱起。当记者让他用三个词形容自己,他一下坐直身子,舒缓的语调陡然清亮:“直率、透明、进攻!”



孙绍振(中)与青年学子交流(福师大供图)

不愿被驯服的“孙猴子”

孙绍振的“进攻”是刻在骨子里的直率与透明。自幼浸淫传统文学的他,凭借过人才赋叩开北大校门,却从入学起就没打算做“规训里的乖学生”。

他的老同学谢冕记得,20世纪50年代,“守规矩、听安排”是不少人的选择,可孙绍振偏不这样。他既不想被条条框框“驯服”,更不甘心丢了自己的想法。他提出大学生要有叛逆性格,结果在团支部受到了批判。“他要动,要不停地动。”谢冕说,他想做一部机器的发动机而不是螺丝钉。

当时的校园百花齐放,北大请来权威教授讲美学,小礼堂挤得满满当当。可一学期听下来,孙绍振只记住了“美是典型”四个字,主流理论的沉闷让他憋得慌。他一头扎进朱光潜的文章里,字里行间的思想冲击力,让他忍不住从校舍32斋四楼望着朱先生的洋房,写信给系里请其授课,结果石沉大海。没等来回,他又追着冯友兰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哲学文章,常在阅报栏前一口气读完,把辩证智慧嚼得透彻。

学习上“不听话”,生活中他也藏不住鲜活劲儿。每天下课回来,他总会在走廊里高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,也会用尖细的嗓音唱俄国国歌。这时,同学们都露出笑容:“‘猴子’回来了。”孙猴子,这是同学们给他的昵称,不仅因为他姓孙,还因为他不安分,总想大闹天宫。

但这份直率也给了他狠狠一击。因为一番言论,他被定了“大错”,只能硬着头皮写检讨。1960年,他从北大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,一年后受过往经历影响,又被调到福建华侨大学教现代文学,后被安排在写作组改作文。

那时的华侨大学没有校舍,也没有图书馆,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,但也没有压垮他。

在他看来,改作文很简单,他一天就



▲年轻时的孙绍振。

能完成三个星期的工作量,剩余时间就在书海遨游。

他的小屋里,一盏昏黄台灯是唯一光源,圈出一方小小的书桌。桌面上,厚厚的书和收音机撑起他的精神世界。

马克思、黑格尔的著作以及英文版《毛泽东选集》,边角被摩挲得卷曲发毛。但他觉得光看不行,还需要听,需要声音。他花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收音机,金属天线伸得长长的,竭力捕捉飘荡在空气中的电波。他听中国之声,也偶尔转动旋钮,听听国外的频道,感受大千世界。

书籍连接着沉静的过去,收音机通往流动的未来。在那些孤独的夜晚,他的世界并不寂静——那里回荡着思考与对话的声音。十年后,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

有人说,那十年把他“养肥了”。“确实,没有事务缠身,没有论文压力,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记忆和理解都正处在顶峰,读了好多以后没有时间细读的书。那段被迫沉默的时光,反而成了我日后思想的沃土。”他很乐观地说。



孙绍振(右二)在《说不尽的孙绍振》新书发布现场为读者签名。本报记者 燕晓摄



孙绍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

破茧而出的美学新见

场,言辞犀利,但句句在理。

这样的“进攻”,从不是为了“赢”,而是为了让不同的声音争鸣。

面临压力他未曾退缩,在1981年发表了他蜚声文坛的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》。他直言“传统是丰碑,也是保守的力量,因此思想解放运动都要对传统持一种亵渎”。谢冕劝他“‘亵渎’两个字会惹麻烦”,他却坚持己见:“新理论的出现总要打破旧传统,文学也一样。自然科学时代开始,从‘上帝创造地球’到‘地心说’再到‘日心说’,那时候也是亵渎上帝。”

这话成了“导火索”。他的文章被《诗刊》批判,批判文章还被不少报纸转载。“本来《诗

刊》批判我也不怕,但报纸转载了,班上的学生都看了。”当天上午9点半他拿到报纸,10点就要上课,他硬着头皮走进教室,没想到学生们“唰”地全站起来鼓掌,还出了一份小的油印报,说“我们需要这样的老师”。后来他还收到几百封来信,全都是支持的声音。

“那时候年轻,不知天高地厚。回过头看,那场大批判反而意外地成就了我,成了文学史上一个节点。”1985年,经历了数年的沉寂,孙绍振依据自己对艺术规律的重新思考,在《文学评论》上发表了《文学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》一文,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。



孙绍振(中)和好友谢冕(左)、诗人艾青一同交流。

敢闯的引路人

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面前。徐怀中翻完那一大摞稿子,立刻说:“就请孙绍振来讲!”

于是,孙绍振北上了,和丁玲、刘白羽等著名作家一同站上军艺的讲台。

一连五个上午的课,他声音清亮,讲唐诗宋词时能把意境拆解得让人心头一亮,聊小说创作时又能逗得学生笑出声。台下坐着的,有后来写《红高粱家族》的莫言,有写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的李存葆。

后来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孙绍振也没想起当年“培养世界冠军”的玩笑话。但2013年莫言来福清演讲那次,他至今记得很清楚——快70岁的他,挤不过往前凑的年轻人,幸亏有学生在第一排角落给了他个位置。莫言要开讲,按惯例该先提“尊敬的领导”,可莫言一眼就看见了他,开口第一句便是:“尊敬的孙绍振老师!”

演讲里,莫言特意感谢:“孙老师讲诗的那些日子,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孙老师对很多诗歌意境、诗意的分析,对我文学语言的改善、对我小说意境的营造,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”最后握别时,莫言还特意说:“感谢栽培。”那会儿军艺每学期的学生民意测验,孙绍振的课总排在第一。

不光是莫言,后来作家宋学武照着他课

上讲的“心口误差”写小说,登上了《上海文学》;麦家在颁奖礼上拍他的肩膀道,“我是你粉丝”;岳南送来自己写的《南渡北归》,扉页上写着“送给我的亲老师孙绍振教授”。这些作家们的认可,比任何奖项都让他开心:“能帮到他们动笔、写出好东西,才是真本事。”

以前总有人说“中文系不培养作家”,可孙绍振用实打实的结果打破了这个说法——不光有了能教创作的课,还走出了莫言这样的作家。他常说自己不想当“评论员”,更想做“教练员”:“就像体育比赛,虽然自己不一定是世界冠军,但能培养出众多世界冠军,才更有意义。”毕竟“只有状元徒弟,没有状元师父”,看着学生比自己强,才是老师的骄傲。

如今90岁的他还在闯——忙着打磨《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矛盾和艺术生命的发展》,20多万字的稿子改了又改,要写到40多万字。他说要凭着中国的文学文本,建立一套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,“一百多年了,该让世界听听我们的声音”。这件事,或许一代人做不完,但他愿意先迈开步子。

采访结束时,他笑呵呵地与我们告别,一改正经模样,仿佛“营业结束”。那一刻,他忽然不像学者,更像一个下课铃响后跑出教室的中学老师。